



社会主义从“哲学”到科学的演进转向

王秀娟

2009-06-18

【内容摘要】我们把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阶段称为“哲学阶段”，这一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关键词】社会主义；哲学；科学

一、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中的“哲学阶段”，寻觅“哲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地
我们把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阶段称为“哲学阶段”，这一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持肯定态度。

1845年以前，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否定哲学史上的众多哲学派别，但没有批判、否定哲学本身。1837年，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①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又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③另外，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这样表述：“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存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④1843年，马克思开始转向费尔巴哈哲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⑥“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⑦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哲学思想作为他们这一阶段思想发展的“核心基地”，并以此为思考问题的总原则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一时期，马克思经历了从理想主义阶段向黑格尔哲学阶段再向费尔巴哈哲学阶段的转变。

理想主义阶段——马克思最初的哲学阶段。中学和大学时期，马克思就信仰过一种他自己称之为“理想主义”的哲学。所谓“理想主义”，就是对“应有”和“现有”关系的一种理解，力图从“应有”出发来解释“现有”，其主要来源是康德哲学和费希特哲学。

黑格尔哲学阶段——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正起点。从1837年转向黑格尔主义开始至1842年，马克思用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观点来看待现实事物、批判旧事物和论证新事物，形成了马克思理念论的自然观、国家观、婚姻观、平等自由观，特别是理念论的哲学观。向黑格尔主义的转变使马克思站到了“现代世界哲学”的高度，汲取这一哲学的许多合理思想，并经过自己的改造，产生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成果。这些积极成果经过以后的改造被保留下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因素，也为“哲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理论

基础。

费尔巴哈哲学阶段——马克思哲学信仰的重要阶段。“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强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费尔巴哈痕迹，二是马克思运用费尔巴哈的方法去分析社会问题，其中，第二个方面是问题的关键。”^⑧1843年至1844年，马克思开始对费尔巴哈哲学大加赞扬，自觉地把费尔巴哈哲学作为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费尔巴哈提供的原则、方法来观察历史问题，并通过在黑格尔主义的重新思考转向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来批判现实和思考共产主义问题，得出了共产主义是向人的本质复归的结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哲学基地”上从哲学原则出发得出的结论，形成了理论阶段的“哲学社会主义”。

二、探寻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把握“哲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

“哲学社会主义”的总特征是站在“哲学基地”上，从某种哲学原则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具体说来，它有以下特征。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原则出发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某种哲学原则的实现。

早在青年黑格尔主义阶段，恩格斯就依据黑格尔哲学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他说：“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⑨共产主义在英、法、德三个国家产生的途径各不相同，“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⑩。青年黑格尔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人，“因为他们不断地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结论，现在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了”。“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绝不会摒弃共产主义。”1844年，恩格斯转向费尔巴哈哲学，他又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原则为出发点来思考共产主义问题。恩格斯说：“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至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哲学原则，他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视作自己共产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依据。马克思认为，德国的革命一直是“理论性”的，现在的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要“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他肯定，费尔巴哈的哲学实现了这一哲学革命，并为哲学共产主义奠定了原则基础。马克思曾经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地理解了您的著作。”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原则看作是一个最高原则，一条“绝对命令”，认为“德国惟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共产主义是一种“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要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因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也叫作“真正的人道主义”、“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哲学原则出发来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性、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它们蔑视人，不把人当人看。无产阶级为什么不满足于现实制度呢？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而共产主义之所以合理、之所以必然实现，是因为这种制度是符合人性的制度，是向人性的复归：“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哲学原则出发来思考共产主义所代表的利益，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超越阶级对立的事业，是代表“人”的利益的事业。

哲学原则体现的不是特殊阶级的利益，而是所有人的利益。既然共产主义是某种哲学原则的实现，那么作为哲学原则实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不是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而应该是代表“人”的利益。

恩格斯认为，“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而且由于有产者有教养，他们可以首先觉悟成为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德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越。……英国人会觉得奇怪，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党，其绝大部分成员自身却是私有者，可是德国的情形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用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在大学生或在商人中间，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重大困难。”由于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主要依靠有教养的阶级，所以恩格斯也把这种共产主义叫作“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还在《莱茵报》时期，虽然马克思这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明确要求国家、法庭不要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上，而应站在理性的和全体公民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在1843—1844年间，马克思已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时他认为，不仅无产阶级不是真正的人，资产阶级也不是真正的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而共产主义就是消灭异化，把人解放成为“人”，因此，共产主义代表的是“人”的利益，而不是某些人的特殊利益。

三、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领悟其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社会主义从“哲学”向科学的转变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相联系的，没有这一哲学革命，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哲学阶段”，他们与以往的哲学家一样地认为：哲学不仅包括世界观，而且还包括各种应当由实证科学提供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知识体系可以由哲学基本原则产生；提供各种知识体系被看作是哲学的职责。因而，对现实世界的具体认识、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也被看作是哲学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原来的意义上，“哲学”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原则成为出发点；其次，从原则引出各个领域的知识；最后，从原则出发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种种方案。

184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认识到这样的哲学的荒谬和无用，否定“哲学”、要求“离开哲学基地”的意向已十分明确，他们开始转向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问题，从现实生活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新世界观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公开承认新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摆脱了种种旧哲学，创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自觉而清醒地意识到了哲学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对否定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公开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明确指出：“这种新哲学不再为人们提供现实世界的图景和现实世界应当怎样的答案，而只是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二，离开了“哲学基地”，终结了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指出新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再提供具体认知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生活的方案，而只是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

第三，更新了哲学的根本理论出发点，转变了对感性对象的理解方式，把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从而为无产阶级提供从人们自身的实际生活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思维方式。

四、清除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桎梏，厘清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哲学革命，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清除了“哲学”障碍，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他们不再从任何原则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分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哲学社会主义”相比较，科学社会主义有以下一些显著特征。

第一、“哲学社会主义”是从哲学原则出发，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问题。

“哲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理论原则，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现实生活。“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现或发明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第二、“哲学社会主义”是从“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出发，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现实生活的基本矛盾出发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转向费尔巴哈哲学后，是依据人的存在和人的“类本质”的矛盾来理解共产主义的历

史必然性的。他们认为，在这一矛盾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的存在脱离自己的“类本质”，这是人的自我否定、自我异化，它在制度方面的结果就是私有制；而在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否定还会被否定，异化会得到扬弃，人的存在回归到人的“类本质”，它在制度方面的结果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对历史之谜的解答”，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就是“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运动。然而，“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只不过是哲学家们头脑中虚构出来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矛盾；关于人类自我异化和异化的自我扬弃的历史发展，也只是“用哲学家的观点来考察”人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结束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哲学阶段”，这一虚构的矛盾被抛弃，他们不再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人的历史发展，而是深入地去研究现实生活的真实矛盾，通过揭示现实生活的基本矛盾来表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再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历史运动的研究，初步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运动，揭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运动和它的内在基本矛盾的考察，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哲学社会主义”是超越阶级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肯定共产主义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阶段”，他们曾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超越阶级对立的。1845年后，他们抛弃了这一想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一幻想：“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这一批判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的自我批评。科学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真实的要求”，“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共产主义代表人类发展的未来。但是，不能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理解为“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不能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理解为共产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共产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②③⑦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第122页，第16页，第575页，第576页，第590页，第591页，第591页，第279页，第279页，第592页。

④ 皇甫志芬：《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从肯定哲学到离开哲学基地》，《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第15—16页，第16页，第16页，第285页，第299页，第230页。

⑧ 张云阁：《“费尔巴哈派”与中间环节的再审视》，《理论探讨》，2007年第3期。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作者单位：淮海工学院）

（网络编辑：胡毅）

上一条
下一条

马尔库塞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学论述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